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方豪 著

根据：香港公教真理学会

台中光启出版社

1967年4月初版 编校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金鲁贤 准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方 豪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发行

2003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上海重庆南路 270 号

邮政编码 200025

天主教上海教区印刷部承印

上海市七宝镇南街 76 号乙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出版说明

1、原书为三册,为便于收藏及阅读对照,现把它们合订成一册,但原书的前言部分及分册方式均保留不变。

2、原书为直排,在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旁均有名号线,上海光启社出版此书时,考虑到现今电脑排字的特点和版面的简约,只在人名下划有名号线,其它诸如“西班牙”、“苏州”、“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名词,因为尽人皆知,故省去名号线。

3、若干古地名,为便于今人理解,略作编者注,或在文中加上括号。

4、文中若干处当为原书误排,我们经慎重地查考其它史料,作了订正,不再作注解,如努尔哈齐,当为努尔哈赤之误。

5、我们利用书中空白处,加上了若干图像,大部分由 **Tomas Lucas** 神父和顾卫民教授提供,在此致谢。

目 录

写在前面(第一册)	1
圣多默宗徒的传说	3
阿罗本	5
景净	7
阿罗憾	11
柏郎嘉宾	13
罗伯鲁	15
马可波罗	17
孟高维诺	19
和德理	21
马黎诺里	23
马薛里吉思	26
马祖常	30
赵世延	35
阔里吉思	37
雅琥	41
方济各沙勿略	43
罗明坚	48
利玛窦	53
高母羨	61
鍾鸣仁、鍾鸣礼、黄明沙	65
郭居静	68
龙华民	70

徐光启	72
李之藻	82
杨廷筠	92
庞迪我	102
高一志即王丰肃、王一元	108
李应试	115
鄂本笃	119
游文辉、徐必登、丘良稟、丘良厚、石宏基、倪雅谷	121
熊三拔	123
阳玛诺	126
罗儒望	128
金尼阁	130
艾儒略	134
毕方济	143
傅汎际	150
邓玉函	156
王徵	163
孙元化	169
金声	173
陈于阶	178
韩霖、韩云、韩霞	182
张賡、张识、李九标、李九功、李嗣玄、陈克宽、林一僑	186
潘师孔、苏负英	193
段袞、段袭、段宸、韩爌	195
瞿汝夔、瞿式穀、瞿式耜	197
焦琯、丁魁楚、庞天寿	204
王太后、马太后、王后，皇子慈烜	211
瞿安德	217

卜弥格	219
郑芝龙	224
利畸	228
凡例(第二册)	231
汤若望	233
李天经	244
李祖白	250
方德望	255
陆若汉	257
杜奥定	265
佟国器、佟国纲、佟国维	269
潘国光	274
许母徐太夫人	281
许缵曾	285
利类思、安文思	292
孟儒望	297
朱宗元	299
张星曜、诸际南、丁允泰	305
严谟	309
利安当、尚祐卿	311
卫匡国	315
祝石	319
穆尼阁	323
郭纳爵	326
殷铎泽	328
罗文藻	335

南怀仁	348
柏应理	361
吴尔铎、白乃心	363
郑玛诺	365
沈福宗	375
吴歷	377
王翬	380
刘蕴德、万其渊	394
陆道淮、张觀光	396
赵仑	398
金圣徵、金绥吉、金造士、沈惠于、王者佐	401
陆希言	404
陶淑	412
闵明我、徐日昇、安多	414
张诚	418
毕嘉、洪若	422
白晋、傅圣泽	429
李明	436
骆保禄	438
巴多明、马若瑟	442
雷孝思、杜德美、费隐、山遥瞻、汤尚贤、麦大成、德玛诺	444
冯秉正	450
多罗	454
嘉乐	464
马国贤	477
德理格	481

出版后记(第三册)	491
王宏翰、陈薰	495
陆方济	497
伊大仁	499
郭廷裳	501
毕天祥、穆天尺	506
阎珺	509
艾若瑟	512
樊守义	516
葛达都、易德丰	518
苏努、苏尔金、勒什亨、鲁尔金、书尔陈、 库尔陈、 乌尔陈、木尔陈等	526
穆敬远	532
郑交赞	536
德沛	540
郭弼恩、杜赫德	543
载进贤	545
宋君荣、钱德明	552
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	554
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	561
黄安多、谈方济、唐德光、汪钦一	565
李安德、苏宏孝、党怀仁	573
吴露爵、谷文耀、殷若望、王雅敬	582
刘汉良、吴君、蓝方济、曹貌禄、陶某、康某	584
杨德望、高类思	587
刘渭、冯文子、郭承佑、刘宋观	589
张若瑟、刘马诺、龚安多尼、费地窝尼小、李若瑟	594
吴均尚、蒋日逵、刘芳名等	603

骆友相、骆均仁、马荣耀、马名捷	610
李文禄、李天一、张全、张化陇等	613
赵斯定、孙本笃、杨安德、蒋金华	618
德天赐、陈若望、周炳德、佟恒善、汪茂德、 刘朝栋、陈杨氏等	622
图钦、图敏、魁敏、窝什布等	628
载加爵、刘多明我、刘必约	634
牟亭漕、刘志唐、李松、李刚义、刘臣、刘刚、 徐健、李文辉	638
张泰、胡二、邵珩、陈鄂斯定、安三、彭彝叙、刘桂林、 蔡伯多禄	640
张绍台、沈韞辉	643
金世达、沈邦彦	646
张蕴华、阎玉亭、沈静渔、陆霞山、黄廷璋	648
郭连城	650
涂知松、郭俊堂、郭栋臣	653
晁德莅	656
夏鸣雷	658
张璜	660
黄伯禄	663
费赖之	667
谭卫道	671
李杖	673
邓明德	677
马良	679
马建忠	684
英华	689
陆伯鸿	694

雷鸣远	696
徐宗泽	702
陆徵祥	704
德日进	706
刚恒毅	709
田耕莘	714
徐诚斌	717
征引书目略	721

写 在 前 面

(第一册前言)

一直有人劝我写一部中国天主教史,我自己的确也蓄过这样一个志愿,并且也曾搜集了不少资料,经历了三四十年,可是,这是天主的圣意,天主赏的,天主也可以收回去,我能说我“生不逢辰”吗?事实上,我的资料,散失在杭州、金华、昆明、重庆、北京、上海……现在,我已没有了这样的雄心,我也不作这样一个计划了。

唯一可以代表我的部分中国天主教史的,是我到台湾以后所编写的《中西交通史》,其中唐宋景教部分列于第二册,元代的也里可温或称十字教部分是在第三册;第四五两册完全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教士介绍西洋学术和传教的经过,只是前者较详,后者较略而已。

公教报徐诚斌神父也是近年催促我写中国天主教史最力的一个,我一直在回避着,因为我知道没有好材料是做不出好菜的。

现在我想出了一个比较适合报章读者口味的办法,就是从中国天主教史上取出若干人,每人替他写一篇小传,作为叙述的中心,这样,从人物的活动中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但是,在一个主要的人物中,同时也可旁及到别的几个人,务使以人

为经,以史事为纬;史以人显,人以史传,或许也比较不枯燥些。

我之所以取名为《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而不取名为“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可见我重在“史”字。凡是对中国天主教史有重要关系的人,虽不属于天主教正宗,也是我笔下的对象。就如唐元时代的景教,在西方当时是目为异端的,可是在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汉文文献中,却没有一丝不合我们教义的。何况已故教宗若望第二十三世和今教宗保禄第六世,已改称一切脱离天主教会的人士为“分袂的弟兄”或“离家的弟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称扬他们远来传播福音的功绩呢?至少,他们为我们铺了路。

其实,这也不是我创始的,萧静山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德礼贤(P. M. D'Elia)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都提到他们。那末,最先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既然首先根据我们的圣经译本,改编成基督教第一部汉文圣经,不是他,我们那部汉文圣经恐怕直到今天还躺在不列颠博物院而被埋没,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有功于我们文献的人,为什么不应该受我们的注意和重视?

当然,为了报上版面的限制,为了是按期发表,我们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所以对于很多伟人的事迹,我们无法作详细的叙述,只希望能将他的重要行谊和对教会的重大贡献,向读者交代清楚。许多外国人名、书名等原名,在一本书中,应只注一次;但在报上发表时,有时不得不重复出现;现在集为一书,仍难免有此现象,也要请读者鉴谅。如果读者有宝贵的意见,请随时寄公教报转,作者是万分欢迎和感激的。

至于重要的征引和参考书目,我想到最后一册出版时,一并列在书后,第一册暂时就省略了。

圣多默宗徒的传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宗教,都有一些信徒喜欢把故乡的本教的历史,拉得愈古愈好,这是人情之常,但有时却离史实太远。

近年我国的一些佛教徒和考古学家,已有主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不得”便是“佛陀”或“吠陀”或“浮屠”,而认为佛教在秦代已传入我国。

我国伊斯兰教徒大多相信首先到中国传布伊斯兰教的是穆罕默德的舅父或他的门徒。

日本的基督教徒还相信《默示录》第7章第2节所称“日出之地”是指日本。

西班牙人还相信耶稣到过巴塞罗那。

我国的犹太教旧称一赐乐业(即以色列),在开封有寺,寺内有三碑:康熙碑说犹太教周时已传入我国;正德碑说是汉朝;弘治碑说是宋朝。

古代的圣经学家如:阿黎雅(Arias M.)、阿拉比德(Alapide)、杰式尼(Gesenius)等都主张《依撒意亚先知书》第49章第12节所说“息宁”(原文:“看啊!有些来自远方,有些来自北方和西方,还有些来自息宁。”)是指中国,因为“息宁”原文是 Sinim,尾声 im 是希伯来文的双数,主要部分是 Sin,那是“秦”的转音,印度和波斯称中国为“支那”(Sina, China, Thina, Jina),都由“秦”而来。高内利(Cornelius a lapide)也附和此说。

近年更有些基督教徒相信三王(三博士)是从中国去的,引证也很繁博,这里不能不从略。还有人推算汉代刘向卒于公元前四年,而耶稣降生大约是在公元前六年;刘向是善观星宿

的天文学家,于是猜想到刘向当年在长安看见异星后,曾往犹太朝拜耶稣,回国后去世。这样的冥思穷索,热诚可嘉,但证据贫乏,可靠性便很薄弱。

其它如说“船”字含有诺厄方“舟”保存一家“八口”的意义;易经“先王以至日闭关,后不省方”,以至人既可解为圣人,至日亦可解为圣日,即安息日,殊不知《诗经·邶风·谷风》:“方之舟之”句,《传》曰:“舟,船也;”《疏》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可见“船”字是后起的。《方言》说:“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据《说文》:船、铅、沿等字都从凸声。而至日乃指冬至日,即冬至日,亦早已成为定论。

在许多传说中,耶稣十二宗徒之一圣多默(S. Thomas Apostolus),曾到中国之说,最为人所乐道。早年的一些西洋传教士在佛教中找到了禅宗初祖达磨(亦作摩),音和多默相似,便疑为一人;岂知达磨原文作菩提达磨(Bodhidharma)乃梁武帝时到我国的一位印度和尚,《释氏稽古略》说在普通元年(520)、《传灯录》说是普通七年(526)、《佛祖统纪》和《佛祖历代通载》说是大通元年(527),可见他比多默要晚五世纪;何况《续高僧传》又说他是宋代到中国的。

早期又有些西洋人,且在中国寺庙所供五百罗汉中,发见有卷发、深目、高鼻的像,便指多默。其实,佛教高僧来自印度的很多,印度属于印欧民族,所以有那些面型;何况我国佛教艺术,渊源于犍陀罗(Gandhara)派,即希腊与佛教混合艺术,亦称为印度希腊艺术,因为印度曾经有过希腊王朝(前175-93),而大月氏和大夏又都受过希腊文化影响。所以罗汉中有类似犹太人或西方人的像,不足为奇。

较强的证据,也不过在加尔代(Chaldea)教会的古祈祷文中,找到了求圣多默感化印度人和支那人信主的词句而已,也是不够证实多默到过中国的。

阿 罗 本

由于中西交通在汉朝时已局部打通,所以在天主教未传入我国之前,天主教的习俗、仪式等,已有一二被我国人传开了。譬如杜环在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曾跟高仙芝从征于怛逻斯河,为大食人所俘,留居十年,写了一部《经行记》,现在《通典大秦传》里还保存有采引的原文:“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这是指主日停止劳工而言。时在八世纪中。

但真正把天主教基本教义介绍到我国来的,却要算景教。而第一个正式来华的景教士是阿罗本。

先说景教是什么教?

景教在我国又译为聂思托里教; 聂思托里^① (Nestorius) 是叙利亚人,原任安底奥基亚城隐修院院长;428年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对于天主圣子降生为人,有不同于天主教传统的见解。我们相信圣母所生的是天主降生为人,是一个耶稣;他认为只是天主圣子结合于圣母所生的人,因此耶稣有了两个主体。从此他成了我们“分袂的弟兄”。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景教历史的第一号文献,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明天启三年或五年(1623或1625)在西安城外五里崇仁寺出土;或说原在盩厔^②。

碑文说景教传入我国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所以在立碑之前已有一百四十六年历史。那年有景教“上德”名阿罗本的,到了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去欢迎,一直进入

编者注:①聂思托里:今又译奈斯托利。

②盩厔:今作周至。

宫内。在皇宫里“问道”，在“书殿”里“翻经”。三年后，由皇帝下诏，说这个教对于社会和世道人心都有裨益，应该让它在天下通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在义宁坊造一所大秦寺，寺里住有二十一位教士。

看这情形，贞观九年以前，阿罗本必定在长安以西，中国边境上，早就展开传教活动，并且一定是很有成就，深为人民悦服，然后有人报告太宗，才会有那样隆重的接待。就像利玛窦到北京之前，在澳门、广东、江西、江苏等处，先盘桓了二十余年（据艾儒略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景教碑已经把我们重要的教义完全介绍过来，如：天主自有（先先而无元）、三位一体（三一妙身）、创造宇宙（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先造万物，后造原祖（匠成万物，然立初人）、人性本善（素荡之心，本无希嗜）、魔鬼引诱原祖（娑殚施妄）、圣子降生（三一分身），救世主名默西亚（景尊弥施诃）、童贞圣母诞生耶稣，天使欢歌（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东方博士来朝（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救赎（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耶稣升天（亭午升真）、新约二十七卷（经留廿七部）、领洗赦原罪（法浴水风，涤浮华以洁虚白）、十字是教友圣号（印持十字）、教士一日分七时诵念日课（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每七日行一次祭礼，整洁自己的灵魂（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等等。

阿罗本的贡献是很大的。但关于他的记载太少；景教碑以外，只有光绪三十四年，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提到“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高宗时（650 - 683）曾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宋人宋敏求《长安志》里，已讹为“阿罗斯”，且仅称“胡僧”。

景 净

据景教碑，景教公开传入我国，即景教大德阿罗本，由唐太宗特派仪队，隆重迎入首都，是在贞观九年（635年）；在此以前必有一段准备时期，可称之为半公开或秘密传习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姑假定为二十年，那应该是在隋末，或再缩短为与唐朝同开始，也当在公元618年。

唐朝景教的遭禁，大约是在武宗会昌五年（845），是年七月、八月都有上谕，第一谕说：“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按清雍正初禁止天主教，但各处教堂被没收，也有先后。我们假定唐时景教也能拖延十年，以公元855为最后禁绝之年，这样算来，唐代景教先后共约有二百三四十年的历史。

可惜文献遗存下来的太少了！景教碑的建立，正当阿罗本入长安后一百四十六年；会昌五年禁教前六十四年，当时还是黄金时代。一百四十多年奉旨公开推行的结果，虽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教堂，朝廷命在教堂内摹绘帝像；玄宗命宁国等五王到教堂行礼；天宝初年，又命大将军高力士以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的写真，送到教堂内安置；一些教士并获得封号，赐紫袈裟；此外，又有“赐天香，颁御馔”等荣宠。若干教堂的匾额，亦出于御题；教士又曾奉旨兴庆宫修功德。

然而二百几十年的教史，在现存史料中，可举为名人的，阿罗本以外，我只能提出景净和阿罗憾了。

景净不但是景教碑文的撰述者，根据碑上的叙利亚文，他还是“省主教（Korepiskopa）兼中国总监督”。